

讲好中国的民间故事

□万建中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迎面吹来阵阵凉风,我们依偎在祖母的怀里,听她讲那遥远的故事,《狼外婆》《狗耕田》《七仙女》《叶限》……构成了很多人儿时的记忆。一些故事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但大量民间口耳相传的故事,因为讲述人的断代而渐渐失传。那些散落在祖国大地上的民间文学“遗珠”,若不能及时得到抢救整理,我们失去的不仅是一个个好听的故事,更是民族文化的根脉。《中国民间文学大系·故事》卷正是举全国之力延续这一根脉的伟大工程,旨在将那些正在被遗忘的民间故事传统重新打捞起来,使之成为永远不会消失的纸质文本,供后人阅读、保存、研究和享用。

民间传统生活的“活化石”

民间故事具有浓厚的生活属性,民众在表演和传播民间故事时,是在经历一种独特的生活,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在从事文学活动。民间故事讲述活动本身就是民众的生活,是民众不可或缺的生活样式。自古以来,民间故事的讲述往往不是单独进行,而是和民众的生产生活及各种仪式活动紧密结合,有着很大的实用价值。故此,其价值包含在当地人的思想、历史、道德、审美等一切意识形态里面,也伴随着当地人的一切物质活动,远远超越了单纯的审美维度。民间故事延续了当地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着当地人的生活世界。

民间故事的讲述始终与某一生活情境联系在一起。民间故事与生活情境之间的联结最为牢固,同时也具有多向度的社会意义。民间故事的讲述过程具有浓厚的表演色彩,但故事的讲述者从来都不是独自站在舞台上演独角戏,听众随时随地都有插话、打岔、插科打诨的可能。故事的讲述,往往都是因某次偶然的闲谈或者某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引起的,讲述人通过讲述某个与当时当地情景相符的故事,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因此,对于当地人来说,民间故事具有重要的交流意义。只有在民间故事讲述的各种因素的关联情境中以及从头至尾的过程之中把握民间故事的生活形态,民间故事才能被全面理解。譬如,独龙族“坛嘎唱”贯穿于独龙族各种仪式场合,表现了对祖先丰功伟绩的追忆。这种民间故事现象在民族地区尤为普遍。倘若脱离了具体的生活情境,民间故事便无法讲述,也失去了讲述的必要。

民间故事讲述中机智、调侃的语言,伴随的插科打诨,夸张的形体动作,惟妙惟肖的表情,表演者与观众奇妙的互动等等,都可引发现场哄堂大笑。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中说: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晚上疲惫不堪回来的时候,娱乐他,恢复他的精神,使他忘掉沉重的劳动,把他那贫瘠砂砾的田地变为芬芳的花园。这是民间文学特有的生活趣味。

在夜间讲故事是民间一种十分普遍的生活现象,有些著名故事集的名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如意大利16世纪中叶斯特拉佩勒收集的《一个故事集》叫作《愉快的夜晚》,日本故事学家关敬吾说,他开始研究民间故事时,阅读的是一位老大娘讲述的《加无波良夜谭》。著名故事家刘德培的很多故事就是在这种场合下获得,在这种场合下讲述。夜谈不限于室内,夏季节节在室外乘凉,秋收季节夜晚在月光下剥玉米、织麻,这种轻体力劳动都不妨碍讲故事。在故事的讲述和接受的过程中,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充实,更有趣。

讲述者的讲述魅力

民间故事的讲述人不是一般的说话人,即不是正在“说话”的人本身,而是一个秉承了某一地方传统并传播和演绎传统的人物。一个人一旦进入叙事,他就必须改变自己的身份、角色和角度。叙述人是叙述人所创造、所想象、所虚构的角色。他可以根据需要,用不同的声音和方式进行叙述,并伴以各种形体和表情动作。故事的讲述人在演唱或讲故事时极为自然地把“说”扩展为一



九色鹿

种表演,一种戏剧化的形式。叙述者不仅是一个故事的叙述人,他们还身兼数职地模拟故事中不同人物的口吻、面容笑貌、行为动作,以有声有色的方式富有临场感地叙述民间故事或演绎民间口头传统。

德国哲学家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讲故事的人》(1936年)一文中说:“民间故事和童话因为曾经是人类的第一位导师,所以直至今日依旧是孩子们的第一位导师。无论何时,民间故事和童话总能给我们提供好的忠告;无论在何种情况,民间故事和童话的忠告都是极有助益的。”在这篇著名文章中,本雅明解释了民间文学教育作用的来源:故事讲述者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他们为两种人,一是远行者,讲故事的人都是从远方归来的人,“远行者必会讲故事”。这样一种人见多识广,比当地其他人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阅历,在崭新的生活道路上行进又不会深陷其间。《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大多来自从遥远地方归来的商人和商船上的人手;中国上古神话中有大量关于远国异人的描绘,《禹贡》《山海经》等都是有关殊方绝域、远国异人的故事。远游者的讲述魅力在于空间方面,在于他们和另一空间的联系和相关的知识。人们总想知道山外的世界,远游者拓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这是神秘的、异质的、充满悬念的、可以引发人们不断追问的生活空间。于是,从此人们的生活增添了一种崭新的空间上的联系、比较和向往。

故事讲述者的另一种类型是当地德高望重者,他们是一群了解本地掌故传说的人。他们同样见多识广,比当地其他人有着更为深刻的社会阅历,在传统的生活道路上行进又在延续传统。他们是深深了解时间的人,是当地历史记忆的代表和讲述者,其行为是在积极延续当地的口头传统,其故事和知识来自于对历史和传统的掌握。讲述的魅力在于将过去与现在联系在一起,通过聆听故事,人们知道了现在的生活是对过去的延续,更加理解当下生活的意义和合理性。

民间故事的生活意义

在中国,发达的是以抒情行为及其产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诗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

开放后,西方建立在结构主义和现代语言学基础上的叙事学才传入进来。“叙事”又称“叙述”,英文翻译为“narrative”一词。叙事问题是当代人文学科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的核心,叙述就是“讲故事”。“讲故事”是“叙事”这种文化活动的核心功能。古往今来的不少批评家都注意到了讲故事作为人类生活中一项不可少的文化活动的意义。不讲故事则不成其为“人”。正像世人皆知的《一千零一夜》所喻指的:从人最终的命运来看,“叙事等于生命,没有叙事便是死亡”,它用无穷无尽的故事赞美了故事本身,赞美了讲故事的



梁山伯与祝英台

人。将这部百科全书般的故事集译成中文的纳训先生在“译后记”中提到:伏尔泰说,读了《一千零一夜》4遍以后才算是尝到了故事体文学作品的滋味。

日本学者关敬吾在描写故事讲述活动中的这种情形时说:“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管它的主人公是人,是动物,是天使,还是山妖,故事里的主人公、讲故事的人和听众们能完全融为一体。人们沉浸在故事里,形成了一种精神集体。”讲述活动这种现场效果无疑起着联合人们、创造生活的作用。民间故事每篇作品的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其所体现的情绪、思想倾向、生活理想有一定共同性。因此,在讲述活动中,作品本身这种共同性经过讲述者的发挥,很容易和听众(观众)发生心理共鸣,被听众(观众)接受,使“个体知觉变成集体知觉”,达到人们的共识和共有的精神趋向。

故事讲述活动作为民众最基本的生活样式,之所以得以传承,主要不是依靠信仰的支撑,也不是依附仪式的神圣,而是出于民众对审美的基本需要,也是各民族、各地区民众将生活诗意化的产物。因而,其中也深刻地凝聚着各民族、各地区民众的审美理想、审美观念与审美情趣。说故事、听笑话的文学活动本身给人带来身心的欢愉。现实生活中的民间故事各种形式的表演,喜剧的成分远远大于悲剧成分。一些比较严肃甚至神圣的民间表演过程,也总会融入一些插科打诨的形式。江西省赣南地方小戏采茶有一种舞蹈动

作叫“矮子步”,幽默、诙谐,让观众感官得到满足。“矮子步”模拟并夸张地表现了采茶负重等姿态,老虎头鲤鱼尾,双手柔如月,腕、手、腿、脚、头具有几种不同的节奏,演员根据情感表达的需要可随时调整。整个舞蹈动作融合在完整统一的音乐之中,表现出气氛的欢快活跃,人物心情的舒爽轻松。小孩观看倍感亲切,大人欣赏之后如回到童年,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舒畅。

民众运用民间故事进行传统的道德教育,这对于中华民族品格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传统的道德思想,相当部分存在于民间

故事之中,并借助民间故事得以传播。在民间,传统道德教育主要是通过民间故事讲述的形式得以实现的,讲述者和听众共同营造了神秘的训诫和警示的氛围。“故事中的事件被看作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与他们分离的或者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善和恶的潜能,因此每个角色体现了一个完整的人的某一部分。”故事戏剧性地表现了这些部分,用形象来提醒人们:应该如何规范行为举止,可能在哪里误入歧途。故事讲述完后,在场的人会有一番交流和讨论,这种讲述空间、故事和故事之后的讨论都是一个完整过程中的要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尤其是年轻人)认识到道德的生命意义,从而使人们行为都符合道德规范。

民间故事对青少年教育的作用更为明显。童话中往往出现魔法宝物母题,如何使用魔法宝物,既是故事情节发展的重心,也是两种道德观念交锋的焦点。魔法宝物实际上是诱使矛盾对立的双方充分表现各自品格和品性的道具。在利用魔法宝物的过程中,善和恶、无私与自私、正义与邪恶、高尚与卑鄙相互对照和衬托,前者建设力的高扬和后者破坏力的放纵泾渭分明。这是借用神灵的手笔摹写人世间的善良、憎恶及贪婪的剧本。魔法宝物母题故事非常巧妙地制造了谁都无法摆脱其诱惑的魔物道具,让把玩它的人不得不暴露自己的道德景况。当正义最终战胜了邪恶,儿童欢快的内心也被注入了高尚的情愫。

民间故事: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优秀的民族民间故事传统。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是建立在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它是历史文化系统中凝聚提炼出来的,分别指向国家、社会和公民个人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而这种公民个人的价值准则在不断规范人的成长,浇铸人的品格。核心价值观的24个字尽管都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但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民间故事传统提炼和升华的结晶,具有鲜明的历时性向度。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需要民间故事,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民间故事是历史的、民族的,或者说是民族历史的积淀。民间故事既是当下的,又是历史的,传统的和民族的,是优秀传统文化有机的组成部分。二是民间故事是民众的、人民的。民间故事根植于民族历史文化的土壤,带有深厚的民族特质;同时,民间故事的创作者和讲述者是具有人民思想、愿望的人民本身,因此,民间故事具有直接的人民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延续着民族精神承载和演绎着民族精神的民间故事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当然应该吸纳外国优秀的文学形式和文学作品,但最能够代表民族群体的崇高精神,最能够表达这种崇高精神的,不可能是外来的,而只能是本民族具有悠久历史的包括民间故事在内的文学传统。

一般而言,民间故事讲述活动在年节期间以及人生礼仪期间最为活跃。这种群体的场合,是民众进行道德教化的最佳时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指出:人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这种前提和条件,包括“传统”在内。讲故事作为社会文化现象之一,它先于个人而存在。民间故事在个体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教化作用,别的东西是不能替代的。所以恩格斯在讲到德国民间故事书的重要作用时,说民间故事书像《圣经》一样培养着人民的道德感,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权利和自由,唤起对祖国的爱。

总而言之,新时期的民间故事,本身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表现,是其承载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民间故事又通过教化、娱乐等途径,不断地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观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民间及民族传统紧密联系在一起。利用民间故事开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动,可以在民间、民族和传统情怀的语境中,使核心价值观进入人们的生活世界,并且深入人心。



钟馗捉鬼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在初期采取了严格的管制措施防控疫情,全国经济和文化活动受到限制。作为传统文化领域的国内非遗实践活动,因疫情导致春节庙会、元宵节灯会、清明节祭扫等节日文化活动取消。表演艺术以及传统手工艺类的非遗传承人和从业者因订单和原材料获取渠道的中断,面临困境。疫情倒逼民间手艺人作出思考和调整,由线下门店转战线上平台,通过在线表演、录制网课、互动授课、直播带货等方式,既开发了新的销售渠道,增加了收入,又丰富了群众疫情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好转,网络化非遗实践呈现出符合数字化时代发展之需的特点,成本低,效果好,“李子柒现象”在全球的持续走红,更加印证我国包含非遗在内的传统文化海外传播一定离不开数字媒介的精准输出。今年围绕“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非遗主题特色活动,也将首次以各大网络平台为主要传播媒介,让民众深度领略非遗的传统魅力。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本质上是动态的,具有适应和进化的能力。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特殊时期,非遗实践本身还被赋予了缓解个人负面情绪、维护家庭和睦、增强社会凝聚力、弘扬传统文化等多重意义和价值,承载着更多的文化价值语义和社会功能。

疫情期间人们更多的时间是待在家里,这也增加了在家庭中教授非遗的机会。诸如烹饪、传统手工艺等文化传统都被重新“点燃”。父母按照祖辈传下来的食谱,同子女在家一起做传统面食、面点,并在网上分享成果。学校也通过网课教授、鼓励学生在家做皮影人物、剪纸等手工艺,非遗手工课对于居家学习的孩子们既是压力调剂,又是技能补充,充分发挥了非遗的美育功能,使得优秀的非遗资源成功转化为教育资源。

网络平台在抗击疫情时期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为非遗传统知识、表达方式的传承和传播提供了新的途径。北京东城拥有兔爷技法、内画鼻烟壶、金马派风筝技艺、邱氏花灯等传统技艺,但非遗传承人年龄跨度很大,他们都选择通过自主学习和直播培训的方式,把在线讲解非遗文化知识、录制非遗技艺网课、直播营销等搬进了直播间。经过直播,销路一下打开,手工艺品一下“秒光”,网评的反馈也非常及时。民间艺人们都感叹于这种不同于线下静态销售模式的出奇效果,表示今后还要为年轻人和小朋友开发非遗制作为手工材料包和国风文创产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时期我国非遗实践的新变

□沈策

品、现代设计产品,还要将录制的网课精心剪辑,作为今后“非遗进校园”的网络教学视频。而许多京剧、豫剧、黄梅戏等传统戏曲表演艺术家则通过直播表演收获了一大批粉丝,既传播了传统文化,又丰富了群众特殊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

虽然疫情至今,医学界还没有研发出有效的治疗药物,但非遗的许多元素正在被用以支持和加强公共卫生措施。例如,我国针灸、艾灸等传统医疗手段在人们的隔离生活中发挥了养生调理、身心调解的辅助疗效,全国公布的包含少数民族的137项国家级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各地草药传统炮制技艺和制剂方法等,作为民间宝贵的抗疫资源正发挥着积极作用。

除此之外,“成都非遗推广大使”李子柒也让人看到中国非遗文化造船出海的可能。她视频里展现的中国文房四宝手工艺、蜀绣技艺、木活字印刷术等传统手工艺,代表的是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和古典生活方式,这是她在全球受欢迎、引起文化共鸣的重要原因。正如疫情期间意大利著名盲人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一人在米兰大教堂前吟唱福音歌曲引人流泪一样,有感染力的文化一定是人们心之所向且有力度的,而李子柒所呈现的精神家园恰好契合了这一特点。

民俗学家玛丽贝尔·阿尔瓦雷斯在《大流行病时代的民俗生活》中这样形容特殊时期民俗学家以及民俗的重要性:“当灾难或其他对日常生活造成重大破坏的情况发生时,医务急救人员通常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人们通常不会联想到民俗学家会作何反应。然而,在这种特殊时期还能‘有质量地生活’,民俗学家能够贡献一定的专业知识。正如伊朗人质危机期间绑在树上的黄丝带,柏林墙倒塌前的涂鸦,民俗学家可以敏锐察觉人类行为的微小变化,他们可以精确探知人类如何通过千奇百怪的方式和地点来寻找意义。”

尽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突出了紧急状态下活态遗产的脆弱性,但同样也可以为非遗提供复兴或创造性的语境,迫使人们重拾对于被遗忘的以非遗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兴趣,甚至对非遗塑造一种新的样貌形态。

疫情期间,通过新闻媒体,我们了解到这一特殊时期人类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许多不寻常的变化。原来很重要的会议好像也没这么重要了,离婚率攀升,家庭教育舒适区被打破,以前必须的文化消费也不是这么必须了,工作、生活、理想的意义正被给予重新思考。在焦虑、同情、恐惧、无奈、愤怒等各种复杂情绪下,民俗学家给出了三个工具包,作为“智慧锦囊”,帮助人们将疫情期间的社交距离转化为充满好奇心和创造力

的探索之旅,以平顺度过这场危机。总结起来即:第一,关注事情本身。民俗学家和人类学家认为人类从日常活动中找寻意义的最简单做法之一就是将来“熟悉”的事物“陌生化”。我们在没有质疑其逻辑背景的情形下接受了很多事物,我们所谓的“正常”生活并不注如此,而是发挥了我们的主观创造力。对于所做的每一件无意识的事情,我们应有机会重塑之前的惯性方式,以此在履行义务和处理各种关系中产生更多同理心和批判性思维。而疫情期间重新学习一门手艺、一个剧种,哪怕是太极拳、口技、围棋、象棋、花毽等传统体育游艺项目,都是对平时生活的突破和尝新。第二,日常生活仪式化。出生礼、成人礼、葬礼、婚礼、生育礼等仪式是生活快照的“框架”,用来标记变化,帮助人类应对过渡。仪式的普遍功能是我们注意对彼此根深蒂固的信念和我们最关心的诸如爱情、家庭、信仰等。在隔离生活中,也应将普通的生活仪式化,早晨的咖啡、下午的散步可以成为现代生活简化的仪式,仪式的意义帮助我们提高劳动的价值,始终为努力带来希望。第三,建立连接点。任何一件事物都因其背后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背景的连接而产生意义。疫情期间,当我们将精力集中到自我独特而个性化的环境中时,这场危机却正在以某种方式改变一切,改变每一个人,远超过病毒的影响。我们需要时间来预测准备或重新组织健康、财富、教育等日常生活的优先事项。

作为“社会调节和缓冲器”的非遗,在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我国的非遗实践并没有因为疫情而中断或停滞,相反,民众对于作为传统文化的非遗的需要,迫使非遗在这样一种紧急状态的情势下转换了新的实践形式,继续在人们的生活中成为化解身心健康危机、精神文化危机的一种手段,持续为我们在建立社会连接、提供群体归属感和摆脱困境的身心慰藉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